

欧洲中左翼现状

恩斯特·海勒布兰德 (Ernst Hillebrand)

引言和概述

1990年代末，中左翼政党执掌着欧盟15个成员国中的13个国家。当时，欧盟各国政府的高层会议似乎成了欧洲左翼的家庭聚会。15年之后，左翼的这种优势地位已不复存在，形势变得大不如前。在整个欧洲，社会民主党纷纷倒台并在选举中屡屡落败，甚至创下近百年来最差的记录。即便最近某几次的选举结果（如法国的奥朗德）显示，欧洲中左翼政党最糟糕的时期也许过去了，但是局势仍旧不容乐观。自2008年以来大规模的金融资本主义危机强烈地冲击了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政策的合法地位，可是，这一切仍然没有为中左翼政党带来新的选举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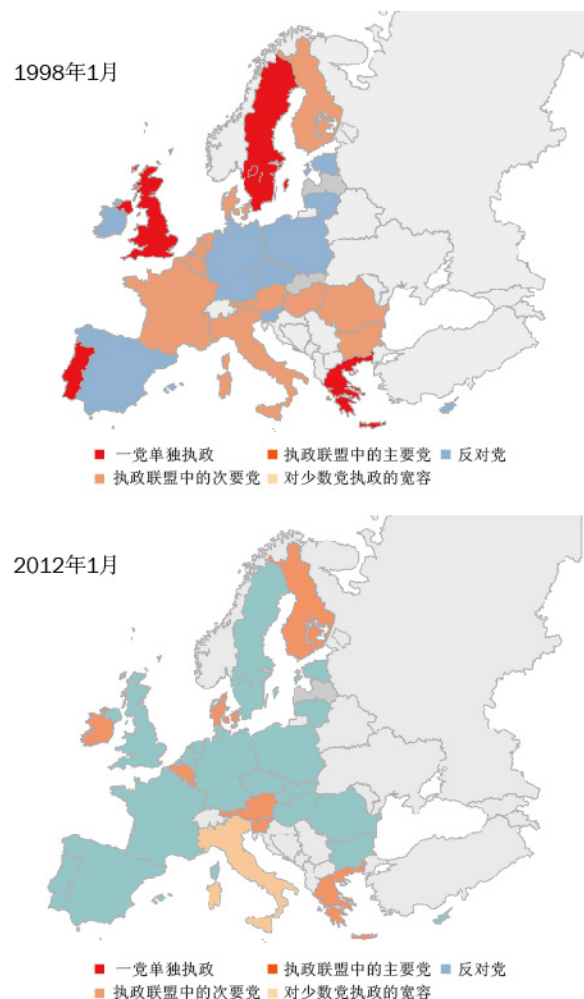
我们如何来解释这一矛盾现象呢？答案一定要从近15年来欧洲中左翼政党在其长期执政时期所取得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成果中寻找。1990年代“粉红浪潮”作出的主要承诺是，要将提高自由市场的经济效率与建立现代福利国家的庄严使命结合起来。安东尼·吉登斯那些名为“第三条道路”的著述从理论上和概念上详细阐述了这种西欧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派所采纳的执政方式。这种方案的各种变体在内容是类似的：他们都建立在温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与财政政策立场相结合的基础上，并坚持继续发挥福利国家职能和实施公共政策干预。在文化和道德价值观问题

上，强调自由主义的立场曾经被用来表明这一政治方案持续“开明”的特征，将中左翼政治认同的重心从社会经济问题转向社会文化问题。劳动力市场和福利制度得以改革并精简，而且税收制度中的再分配因素也减少了。重商政治应该会刺激宏观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收入、就业机会和税收，同时降低福利依赖和失业率。1980年代在保守党的领导下开始的对公有制企业以及服务业进行的私有化过程在继续着。在整个欧洲，新的欧盟法规强化了自由主义和放松管制的趋势。简言之，中左翼政党自身表现为技术官僚型改革者以及资本主义“更有效的管理者”，竭力拉拢中产阶级和有专业背景的选民。这一努力在最初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然而，2000年代中期中左翼政党戏剧性的选举失败表明，他们的这一策略不再奏效。从长远看，“第三条道路”的技术官僚方法只会事与愿违，而且会使得中左翼政党的选举基础比10年前更加薄弱。

恩斯特·海勒布兰德博士 (Dr. Ernst Hillebrand) 出版过许多针对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分析文章。目前他在位于德国柏林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担任国际政治分析处处长。在此之前，他曾受艾伯特基金会委派，赴欧洲其它国家、拉美和非洲等地工作。

图表 1 欧洲联盟中的社会民主党 (1998/2012比较)



来源: <http://www.fes.de/ipa/inhalt/monitor.php>

衰弱的原因

选民方面大规模醒悟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六个方面:

(1) 社会经济方面承诺兑现不足

“第三条道路”政府未能兑现他们增强经济活力和减少社会不平等的承诺。在他们执政期间,多数情况下社会不平等都在加剧。这一动态也影响到了中产阶级,1990年代左翼改革派曾承诺会专门保护

他们的利益和需求。施罗德(社民党)执政时期的德国就是一个例子,在其执政期间,社会不平等加剧的速度甚至超过同时期小布什执政的美国¹。这一事态反映了中左翼政党不能(也不愿意)改变的某种长期分配趋势,即,从1980年代至今,反映社会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一直保持着增长势头。2008年经合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至少自1980年代中期(很可能是1970年代中期)起,收入不平等就一直在增长着(OECD, 2008)。在过去的25年中,欧盟国家的工资份额,也就是工资在国内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在持续减少,已从72.1%降至68.4%。与此同时,就业率却从1990年代中期的61.2%上升到如今的68.6%。这意味着更多的工人分配到更少的工资收入。对存量财富的分配比收入分配更加的不公平。这些趋势最主要的受益者是一小部分超级富豪阶层,他们收入和财产急剧增加,而且他们的剩余资本又推升了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的投机泡沫。

尽管存在实际的经济增长,也尽管劳动力市场改革并未迈出大步,但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仍然就居高不下。英国工党执政末期,英国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20%。西班牙左翼政党执政期间,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40%(当时欧盟平均失业率为25%)。关于进步主义教育革命的承诺被证明空洞而苍白。教育应当促进的社会流动性未见改善,甚至反而有了恶化。而且,在过去20年里,欧盟各成员国高中毕业生的数量几乎没有变化。在德国社民党执政时期,大学生数量的增长率仅为0.5%。新的工作机会并非主要产生于服务经济的高收入行业,倒是在低端行业。如今,欧洲的年轻人(包括接受过良好教育者在内)不仅遭遇高于平均水平的失业率,而且还相对更加贫困。据统计,英国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有37%的人生活贫困,这项数据在德国高达42%,在荷兰则为49%。

¹ 战后德国是一个传统上基尼系数适度的比较平等的社会,社会不均程度远不如美国。施罗德政府的自由改革,如劳动法的自由化以及对劳动力市场解除管制增加了临时就业,并使低收入行业有了扩大。此外,照顾高收入人群的税收改革对国家收入分配影响强烈,偏袒了富有阶层并加剧了收入不均现象。

(2) 启动福利改革打击了中左翼政党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的核心选民

引入劳工市场改革是为了克服劳动力市场的僵化性并为长期失业者带来工作。这些政策对于总体失业数字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它们也引发了广泛的负面效应，如非正规就业和临时工作的增加，以及（尤其是在德国）低收入行业急速扩大。

作为改革方案的一部分，中左翼政党引入了福利改革，旨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让长期不工作的福利接受者融入劳动力市场。福利性支出以资产调查为前提条件，主要服务于极度贫困人群。这种将福利集中于特困阶层的做法惩罚了处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着的穷人，造成福利享受明显向移民倾斜，因为移民往往技术水平和收入较低，失业率较高且家庭人口较多。相反，工作着的穷人虽然生活拮据，但仍被排除在享受福利的特困阶层之外。此外，这种只问需求、不问贡献的福利普救方式几乎完全将福利享受与对社会作出的财政贡献割裂开来，恰恰是那些就业者通过税收缴纳和强制社保而在支付着福利体系。由于为社会付出的人反而不是受益者，这一改革引发了人们对福利国家“社会公平”的大肆质疑。同时，欧洲大多数公众不接受这样的理念：不论人们之前对社会贡献如何，他们都应该取得福利津贴。在这种情形下，英美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谈到，现代社会中存在着对寄生虫的憎恶，存在着对社会财富因不公正索取而会枯竭的恐惧（Sennett, 2004）。

(3) 社会结构变化削弱了对福利再分配改革的接受度

与此同时，与福利制度相应的总体社会前提条件正在发生改变。从历史上看，欧洲以社会凝聚为目标的福利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靠的是根深蒂固的阶级共享感和民族认同感，这种感受在社会内部产生了强有力的社会联系纽带。但是在工业时代，这些新的社会经济阶级认同正在消失，更注重个人主义的社会正在兴起。众多新职业、

新文化、新社会的氛围出现了。在过去40年里，大规模的移民导致欧洲民族、文化和宗教多样性的巨大成长。因此如今西方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日益广泛多样的价值观、文化模式和行为准则同时并存。对于一个既定国家的全体居民来说，那种拥有共同文化或者是共同价值观的理念已显得越发不切实际。法国经济学家丹尼尔·科恩数年前曾经写道：“后工业社会”这个术语中仍存有疑问的不是“后工业”这一术语，而是“社会”这个概念（Cohen, 2006）。这些变化确实影响着人们对于再分配政策和凝聚型福利制度的接受度。在《包容他者》一书中，哈贝马斯论述道，集体认同在走向瓦解，同时，欧洲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在削弱，这对左翼政治而言尤其是个根本性的问题。本来，只是通过构建了国家认同，才得以创立了特定的文化基础，才使得凝聚型再分配的理念从一开始就可以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发展起来的（Habermas, 1999）。当然，仅仅把欧洲社会凝聚力的削弱和欧洲社会日益增长的异质化和个性化联系起来是不对的。政治本身也对社会凝聚力的削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实中，资本、商业收入和利润日益变得无需再为福利制度而作贡献，许多的国家已经引入了一种对于最高收入的征税上限，同时公开容许少数富人大量逃税。法国的哲学家马塞尔·戈歇极而言之，如今“社会凝聚”这意味着让较贫困的人支持非常贫困的人（Gauchet/Winock, 2008）。

(4) 新的社会文化问题和矛盾不断兴起

在过去20年里，新的社会文化问题已加重了其政治分量。这其中的许多问题都与自1960年代以来大规模迁入西欧的移民有关。然而，传统的工人阶级对于移民的影响经常会抱以一种疑虑的态度，中左翼中产阶级的选民则往往赞同开放边界和移民。针对如何让这些外来者适应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宗教背景这一问题，本国的人民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支持同化策略，有的则赞成通过多元文化方式，邀请这些外来者在此

居住并且在新的生存环境中仍然保持其原有的文化身份。在过去20年里，随着反西方伊斯兰思想在穆斯林移民中的上升，以及随着9·11、马德里和伦敦爆炸事件的发生，这一个问题变得简直具有爆炸性。但是，当中左翼党派仍然坚持他们的多元文化方式时，大量支持这些党派的选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却在转向一种更加强硬的、反移民而且更加倾向同化主义的立场。在移民和多元文化问题上的情绪，对于民粹主义右翼党派的兴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法国的“国民阵线”或意大利的“北部同盟”）。这些党派已经抽走了左翼党派很重要的一部分传统工人阶级选票。在许多国家，就争取无产阶级蓝领工人的选票而言，右翼民粹主义党派已经超过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党派。

（5）进步主义党派与其部分选民之间存在意识形态的疏离

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导致了西方社会中自由世界主义者和民族群体主义者之间呈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分歧。这种分歧正好是贯穿于支持社会民主主义的选民联盟，这种联盟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所组成（Kriesi, 2005）。由于在选举上原本依赖于工人阶级的选票，中左翼党派现在往往越发受到中产阶级的控制，其党派中的大量的成员、领导以及国会议员都从中产阶级中招募而来（Butzlaff/Micus/Walter, 2011）。党派精英和激进分子常是强烈亲欧盟派，赞同全球化和移民；然而，原来支持他们的工人阶级选民对这些进程的质疑却日益增长。在此情形下，中左翼政党疏离了它们原来的相当一大部分选民，这些党派不再能够与社会中的底层部分密切联系。相对于这部分底层人群来说，中左翼党派的观点和关注点都显然有所不同。相反，新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以及某些左翼运

动正在努力填补这个空缺。这些运动日益被边缘化的人群所利用，成为一种表达他们失望和不满的媒介。

目前，二战以来所形成的欧洲中左翼战略基础的社会联盟——工人阶级和部分地位稍低的中产阶级之间的联盟——将很有可能会解体。但是，与用于安抚动荡的中产阶级的“第三种道路政治”的基本设想相反的是，工人阶级的选票正在减少。2010年英国的最后一次普选中，工党的中产阶级（ABC1）选票首次超过了其工人阶级（C2DE）选票（Goodhart, 2011）²。新的工党领导埃德·米利班德在2010年选举失败后说道：我们失去的是主要支持我们的工人阶级的选票，因为每失去一个专业阶层的选民，我们同时失去三张分别来自特困阶层、低收入阶层、依靠福利阶层的选票，再加上熟练手工业者，这一比例就变成了1:6（Miliband, 2010）。

（6）后民主时代的代议制民主出现危机

许多欧洲人，特别是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欧洲人，已经对于代议制及其政治制度和机构效能失去了信心。在整个欧洲，投票率虽然仍比美国高，但还在持续下降。欧洲社会存在着一种强烈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失落感，它不仅触及到了不稳定的下层阶级，而且还深入到中产阶级中。只有一少部分公民仍旧相信现存的政治参与渠道能够给予他们真正影响政治或者政府行动的权力。传统中左翼选民的怀疑态度尤为明显。2009年普选几个月前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百分之零——是的——没有一个德国的蓝领工人相信他们的投票行为会对政府政策的形成产生显著影响。甚至在当前债务危机和同时产生的欧洲政治对于金融市场需求作出无条件投降之前，人民的生活都被一种失落和失控感主导着（Sennett, 2006）。

² NRS社会分级是一个用于英国的人口分类系统。这个系统按照户主的职业来进行分类，A代表中上阶级；B代表中产阶级；C1代表中下阶级；C2代表熟练技工阶级；D代表工人阶级；E代表最低生活保障人群。这些等级通常用ABC1和C2DE两个组来分别代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在过去10年里，对于代议制民主的信任危机不断的加剧，尤其是因为中左翼政治染上了技术官僚特性，这种特性强化了一种印象，即选民没有真正有效的政治选择。欧盟的多级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国家、区域和基层政治实体权力失落加速了这方面的发展。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似乎存在着英国政治科学家科林·克劳奇总结过的“后民主”进程：某些重要社会机构如工会和教堂的政治影响在丧失；政治日益呈现专业化的趋势，因此政客们都来自一个更加有限的社会背景，大众政党由此衰弱，而且精英阶层的文化脱离了国家背景，反而作为一种新的全球的和跨国的“精英意识形态”脱颖而出（Crouch, 2004）。普通人民感到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政治对话之外，因为其他的利益集团能够更加有力地表达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的政治影响比普通公民组织松散的利益集团要强得多。

中左翼政党对于这些事态的反应十分迟缓，他们与普通群众的日渐疏离使得他们变得迟疑，不愿采取或者发起更加积极的民主参与。这不仅限制了进步主义的社会文化政治，而且还限制了技术官僚们的福利和经济改革。但是，就下降的选票率以及对民主参与的变革潜力失去信心而言，其对左翼政党的选举命运所造成的影响往往要远远强于其对保守党派所造成的影响。

未来几年的前景

由于以上这些事态的发展，目前欧洲中左翼处于矛盾之中。总的状况是消极的，大多数这些情况都是近几年来他们政治行动（从金融市场自由化到欧洲一体化）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然而，这些总体状况部分地被一些更加有利的短期因素所抵消，这些短期因素源自新自由主义学说所酿成的危机。

- 中左翼政党的选举基础遭遇重创，在社会文化议题上所获的蓝领工人选票，败给了民粹主义右翼。在未来几年里，欧洲中左翼政党组织将会缩小，他们的选举基础将集中在公务员、较低阶层的学术中产阶级和移民社区。2009年欧洲大选之后，代表欧洲社

会主义类型的党派（欧洲范围内的社会民主和社会主义党派联盟）的一项调查显示：其可靠的选民核心已经缩至欧洲选民总数的13.5%，另外13%的选票则有可能投给欧洲社会主义类型的党派。这意味着这些党派的选举基础目前约占欧洲选民四分之一（PSE, 2011）。

- 因为明显缺乏思想和纲领上的导向，第三条道路还没有被一种能反映当今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包罗万象的政治新理念所代替。几乎所有的欧洲中左翼政党目前都在设法改革他们的党纲，使之适应现代化的需求。但是一套令人信服的新的“叙事”话语系统仍有待发展。尽管如此，这一新叙事的诸多元素已经可以确定。他们包括更加强调社会公平、市场再规范、生态可持续性，以及生活质量、工作生活平衡等内容。公民对政党决策以及一般政治决策的参与也将成为其中的要素（Hillebrand/Maass, 2011）。与第三条道路时期的政治纲领相比，这意味着未来对于开明政治的解读将更加注重公平主义和生态主义。

- 权力的行使和政治影响都将会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联盟政治，本质上包括同自由的中产阶级政党，如英国的自由民主党或德国和法国的绿党将组成联盟。未来，欧洲政党制度的分化程度将会加深，反映出社会的异质性和多元性。未来，多数派地位只有依靠政治联盟才有可能达到，也就是说，立场相似的主流政党（包括温和的右翼党如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将在相对多变和灵活的联盟中才能构建多数派地位。

- 东欧中左翼政党的处境更加糟糕，那里，社会经济承诺往往落空，同时，党派高层在执政期间普遍出现腐败和暴富问题。这在道德层面上加重了选民的不满，东欧政坛短期恢复的可能性远远小于西欧。在东欧各个国家，传统的中左翼政党，特别是改革后的前共产主义党派，正处于选举无望的边缘。这些党派可靠的核心选票正因为人口原因而在减少，而且跟西欧国家相比，其结构性支撑力量也更弱小。在西欧，社会民主尚可依靠一种人们对福利国家和长期组织传统的强烈依赖感。

另一方面，前景并非一片黯淡。目前金融资本主

义的危机正在削弱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以及保守和自由政策的可信度。由于当前中左翼势力自身曾积极参与到了自由主义的改革政策和对金融部门的放松管制过程中去，他们并未从目前这一危机中直接获利。但是，公众对于放松管制和新自由市场之类原教旨主义的支持几乎已经完全不复存在。跟中左翼政党相比，保守党同这些政策的联系往往更加密切，如今也更加被动。此外，目前经济和金融危机已经将公共关注转回到社会经济问题上来。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和社会文化问题在左派选举联盟内部所造成的分化后果。不过，有一个切实的威胁，即中左翼党派所持的强烈亲欧洲立场将会制造一个新的分化议题，可能会被保守和右翼党派用于分化左派的部分工人阶级选票。

鉴于以上所有的原因，在中期选举中，欧洲中左翼党派最有可能出现一个缓慢复苏的局面，这以在联盟政府（特别是西欧）中参与的增加为标志。社会民主虽然远不及二十世纪下半叶时那样强大，但是它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更加积极的领导下，凭借新的旨在重新联合工人阶级选民的政策建议以及反映强烈个人主义社会关注和利益的政治策略，这些党派甚至有可能重新变成这个时代的政治领导力量。他们目标应该至少是在个人自由、公民拥有政治权利、生态可持续发展、社会平等这样的基础上，实现彻底的现代化以及完成欧洲工业社会的转型（Hillebrand, 2009）。

参考文献:

Butzlaff, Felix; Micus, Matthias; Walter, Franz (2011): *Genossen in der Krise? Europas Sozialdemokratie auf dem Prüfstand.*

Cohen, Daniel (2006): *Trois leçons sur les sociétés postindustrielles*, Paris.

Crouch, Colin (2004): *Post-Democracy*, Cambridge.

Gauchet, Marcel; Winock, Michel (2008): *Une année de sarkozysme*, Le Débat, septembre 2008, Paris.

Goodhart, David (2011): *Labour can have its own coalition too*, The Independent, 20/3/2011.

Habermas, Jürgen (1999): *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 Frankfurt am Main.

Hillebrand, Ernst (2009): *A Society of Empowered Citizens - Outline of a Social Democratic Projec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rlin, 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

Hillebrand, Ernst; Maaß, Gero (2011): *In Search of a New Political Narrative for a Solidarity-based Society in Europe - Ten Key Questions about the Future of Social Democracy in Europe*, Berlin, October 2011, 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

Kriesi, Hans-Peter; Grande, Edgar; Lachat, Romain; Dolezal, Martin; Bornschie, Simon; Frey, Timotheos (2005):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political space: six European countries compared*,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5(6), 2005: 921-956.

Miliband, Ed, (2010): *To win, we must leave New Labour's comfort zone*, London.

OECD (2008): *Growing Unequal?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in OECD Countries*, Paris.

PSE (2011) *Profiling PES Voters: Report for the Party of the European Socialists on the 2009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Brussels.

Sennett, Richard (2004): *Respekt im Zeitalter der Ungleichheit*, Berlin.

Sennett, Richard (2006)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London.

往期简报

第1期

二十国集团：一个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全球治理框架？
托马斯·弗斯（Thomas Fues）

第2期

全球化挑战背景下的全球工会联盟
托斯藤·米勒、汉斯-沃尔夫冈·普拉策、施坦方·吕卜
(Torsten Müller, Hans-Wolfgang Platzer and Stefan Rüb)

第3期

新加坡：独大型政党制度下的去政治化公民社会？
陈思贤（Kenneth Paul Tan）

第4期

德国住房政策：一个最佳实践典范？
比约恩·埃格纳（Björn Egner）

第5期

中国行政赔偿制度的演变与新近发展
杨寅（Yang Yin）

第6期

出口拉动型增长的终结：对新兴市场和全球经济的影响
托马斯·佩利（Thomas I. Palley）

第7期

政党、党员动员与权力管理：以德国为例
盖尔特·米尔克（Gerd Mielke）

第8期

核能的末日？国际能源政策转变思想的时候到了
妮娜·内策尔（Nina Netzer）

第9期

中国经济转型与城镇“生育收入惩罚”
贾男（Jia Nan）、董晓媛（Dong Xiao-yuan）

第10期

欧洲的排放交易体系：低碳经济的高效力高效率工具
汉斯-约阿希姆·齐新（Hans-Joachim Ziesing）

第11期

以蜗牛般的速度前进：德国从妇女选举权到性别平等政策
贝瑞克斯·波维尔（Beatrix Bouvier）

第12期

社会性别预算：一种性别平等政策的战略
伊丽莎白·科拉策、芭芭拉·施蒂格勒
(Elisabeth Klatzer and Barbarb Stiegler)

第13期

国际能源政策的重要转折点：中国的关键角色
弗里德曼·米勒（Friedemann Müller）

第14期

家庭政策和生育率：欧洲国家的现象和挑战
索尼娅·布卢姆（Sonja Blum）

第15期

全球可持续发展机构改革
萨沙·穆勒-克莱纳（Sascha Müller-Kraenner）

第16期

“微时代”青年的社会参与 —— 基于对上海青年的调查
黄洪基（Huang Hongji）、周颖（Zhou Ying）

简报特刊

家政工人的保护——挑战及展望
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2011年5月

简报特刊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智库：它们起作用吗？
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2011年9月

艾伯特基金会其他出版物

中国产业民主 - 兼论德国, 韩国与越南

主编: 鲁道夫·特劳普-梅茨 (Rudolf Traub-Merz)
岳经纶 (Kinglun Ngok)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年

再分配促增长? 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复苏

主编: 鲁道夫·特劳普-梅茨 (Rudolf Traub-Merz)
上海: 弗里德里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 2012年

亚欧参与式预算: 民主参与的核心挑战

主编: 伊芙辛多默 (Yves Sintomer), 鲁道夫·特劳普-梅茨 (Rudolf Traub-Merz)
张俊华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1年

中国、欧盟与拉美: 当前议题与未来合作

主编: 克敏 (Birte Klemm), 牛海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

老年人护理与护理保险: 中国、德国和日本的模式及案例

主编: 蓝淑慧 (Susanne Langsdorf), 鲁道夫·特劳普-梅茨 (Rudolf Traub-Merz), 丁纯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0年

劳动关系比较研究: 中国、韩国、德国/欧洲

主编: 鲁道夫·特劳普-梅茨 (Rudolf Traub-Merz), 张俊华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

Comparative Industrial Relations: China, South-Korea and Germany/Europe

Rudolf Traub-Merz and Junhua Zhang (ed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0

地方决策中的公众参与: 中国和德国

主编: 刘平, 鲁道夫·特劳普-梅茨 (Rudolf Traub-Merz)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9年

中欧非合作: 机遇与挑战

第六届全球治理上海会议 (2008年3月14-15日) 论文集
主编: 闫瑜
上海: 艾伯特基金会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08年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Asia-Europe Security Cooper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Shanghai Workshop on Global Governance.
Katharina Hofmann, Katja Meyer and Yan Yu (eds.), Shanghai: FES and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7

Abou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FES) is a private cultural non-profit institution committed to the ideas and basic values of social democracy. It was founded in 1925 and aims to further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education of individuals in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and pluralism. It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nnects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with partners in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the FES strives for facilitating participation, pluralism, rule of law, social justice and non-violent conflict resolution in different societies.

Learn more about FES: www.fes.de
Learn more about FES in China: www.fes-china.org

Contact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eijing), Ta Yuan Diplomatic Compound, Building 5, Entrance 1, 12th Floor, Office 5-1-121, Xin Dong Lu 1/Chao Yang Qu, 100600 Beijing, VR China

Friedrich-Ebert-Stiftung (Shanghai), 7A Da An Plaza East Tower, 829 Yan An Zhong Lu, Shanghai 200040, VR China

Briefing Paper

To subscribe the Briefing Papers send an e-mail to: subscribe@fes-shanghai.org

To unsubscribe send an e-mail to: unsubscribe@fes-shanghai.org

The opinion voiced in this publication is that of the authors and does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opinion of FES.

Imprin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entre-Left in Europe. Shanghai: FES-Shanghai Office, 2012.

Responsible: Catrina Schläger, Resident Director, FES Shanghai Coordination Offic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